



AJS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AJSS, Vol. 1, No. 1, 2026, pp.25-31.

Print ISSN: 3106-6836; Online ISSN: 3106-6844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a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AJSS260104ddhpp>



规训、话语与异托邦：权力视角下的《马桥词典》

吴 琛 (Wu Chen), 郭紫薇 (Florence Kuek)

摘要：《马桥词典》以“词典体”的叙事形式，用语言搭建起了一个民间的异托邦。本文旨在使用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马桥这个异托邦进行话语分析。语言在其中作为话语存在，它选择着语言的使用者并规范着地域文化的秩序。权力通过话语对人们展开规训与放逐，实现着达到稳定性的功能。而在面临外来的现代性和外来的权力话语冲击时，马桥的民间话语在显示出拒斥形态的同时也接纳和改变了外来的话语。马桥的世界本质上是由话语碎片拼贴而成的混杂场域，权力的城邦既在规训中自我固化，又在现代性的烙印下发生着深刻的语义重塑与生存变迁。

关键词：《马桥词典》；权力话语；福柯；异托邦

作者介绍：吴琛 (2001-)，男，天津人，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邮箱：530563746@qq.com，联系电话：+(86)18322089156，通讯地址：天津市蓟州区津围线华府御墅。郭紫薇 (1971-)，女，马六甲人，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文学批评与翻译研究。邮箱：florencekuek@um.edu.my，联络电话：+(60)164459274，通讯地址：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Title: Discipline, Discourse, and Heterotopia: A Power Perspective on *A Dictionary of Maqiao*

Abstract: Utilizing the narrative form of a "dictionary-style" novel, *A Dictionary of Maqiao* constructs a folk heterotopia through language. This paper aims to conduct a discursive analysis of this Maqiao heterotopia using Michel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discourse. Within this space, language exists as discourse; it selects its users and regulates the order of regional culture. Power exerts discipline and exile over individuals through discourse, fulfilling its function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impact of external modernity and foreign power-discourses, the folk discourse of Maqiao exhibits a stance of rejection while

simultaneously assimil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se external influences. The world of Maqiao is essentially a hybrid field collaged from discursive fragments. This "city-state of power" both solidifies itself through discipline and undergoes profound semantic reshaping and existent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mprint of modernity.

Keywords: *A Dictionary of Maqiao*; Power discourse; Michel Foucault; Heterotopia

Author Biographies: Wu Chen (2001-), male, native of Tianjin, Master's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Malaya, primari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530563746@qq.com, Tel: +(86)18322089156, Mailing Address: Huafu Yushu, Jinwei Line, Jizhou District, Tianjin.

Florence Kuek (1971-), female, native of Malacca, Senior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Malaya, specializing 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florencekuek@um.edu.my, Tel: +(60)164459274, Mailing Addres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Malaysia.

90年代,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出版,其词典体的形式在当时的文坛影响甚广。他说“正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村庄开始……从而获得了写作《马桥词典》的最初动力。”(韩少功,2017,p.406)在马桥的民间世界中,这个村寨是一个被不同的语言、词汇编织形成的另类空间,区别于早已走上现代化的中国大地。这些词汇不仅是村寨实际使用的语言、更是作者编织这个另类空间的方式,因此,马桥世界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构的。这种双重属性就如福柯(Michel Foucault)论述中的异托邦镜子,它是一种真正成为现实存在了的“偏离乌托邦”,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混杂的权力结构,也从中看到与之差异化的现代世界。

《马桥词典》中的词条不仅是一个个指涉表征的符号,它们更属于话语的范畴。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讨论了话语和实践的关系——话语本身就是实践。做词条的语义分析,就是一种话语分析,所谓话语分析就是“考察话语的实践条件、受制约的规律和它在其中运作的场地,揭示话语背后蕴含的社会权力关系。”(李智,2017,p.108)这是因为,话语本身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又改变着社会的权力关系。话语呈现、加深以及合法化着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或者颠倒、反叛这种权力关系。另一方面,话语的生产性标志着话语可以产生知识、产生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产生整个文化世界。在马桥的世界中,没有脱离话语中的人,也没有脱离话语中的权力。话语的权力渗透进每一个马桥人的精神世界中,《马桥词典》中的“词”因权力存在,也塑造权力。看待《马桥词典》中“词”的方式,就是我们借由异托邦之镜看待自身的方式。正如福柯(2001,p.393)所说:“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词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

一、识别与控制:民间的异托邦

在《马桥词典》的文学场域中,马桥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湘南村寨,更是一个由话语堆叠而成的、典型的“异托邦”空间。话语在马桥文化中搭建起一套人们的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米歇尔·福柯认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度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许宝强、袁伟,2001,p.3)语言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交流功能,化身为一套精密、严苛且具有排他性的识别与控制系统。在福柯看来,话语首先对说话人有一套选择机制,它确定了谁能够进入这一套话语体系之中,从而实现对

地域文化的严密防守。

马桥的话语体系首先表现为一种严厉的进入机制。马桥镇位处湖南汨罗县，正是与主流社会区隔的边地，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心态的独立与排他：

东接双龙弓的田土，北向天子岭的起伏山脉，与岔子沟以天子岭上的水流走向为据，骑岭分界。西邻张家坊。南通龙家滩，并有小道与六十年代建成的长沙岳阳公路李安宁街，如果坐汽车去县城，就得走这条路线。（韩少功，2017,p.10）

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中，异托邦有如下的特征：“异托邦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一般地说人们无法自由进入一个异托邦的场所。”（福柯、王喆，2006,p.56）在福柯的论述中，这种场合的例子是军营和监狱。而马桥的边界正与异托邦的本质惊人地一致，马桥本来就是远离城市的乡村，在地理位置上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而马桥的民间话语则显示了马桥对自身文化的控制，话语在此刻化身成为一种“文化准入证”，它维护着马桥文化的统一，也对试图进入话语体系的人进行天然地筛选。

“同锅”在马桥的方言中是同宗、同族、同胞的意思，同胞兄弟在马桥这里叫做“同锅”，这不仅是一个称谓上与普通话的区分，更暗含了马桥人对宗族血脉和饮食这种基本行为的关系。在马桥人看来，所谓“一家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一个锅里吃饭。这是马桥当地的方言，它不能为外人所使用，来到这里的知青们只能受到话语的排斥。最体现这种话语对人们能否进入话语界的筛选的，是“黑相公”的词条：马桥人在围猎野猪时使用的指示方向的词都是重新约定而成，北实际上指南、东实际上是西，只有运用这样暗语再配合特定的仪式才能迷惑畜生。这种话语的异化并非单纯的技术方式，而是一种高度的社会化的仪式。只有通过本能地运用这种话语，再配合特定的原始仪式，才能在马桥的语境中被视为“自己人”。牟继生是来到马桥的知青，他虽知晓马桥人围猎时的密语，但事到临头脑子转不过来弯，他的思维无法完成这种话语权力的转换。在马桥人围猎的那几天，他没能赶上队伍而是在岭上转来转去、迷失了方向。这就是话语对人的识别和筛查，它对马桥人起着统合的作用，但不记得方言的牟继生只能被排除在系统之外。“若不符合一定条件或一开始就不具备资格，则不能进入话语界。”（许宝强、袁伟，2001,p.14）话语在马桥作为一种工具存在，确定了文化知识的统一，也时刻识别着说话人的身份。

马桥的民间话语不仅对外排斥，对内还通过一套知识结构的搭建，实现了对民间文化一致性的强力控制。最能体现这种控制的是马桥人对性别的认知与界定。在传统的乡村，为了维护男性的话语权，话语被制造出来确定父权的文化结构，确定男性在民间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女性在传统的民间文化中往往没有命名权、没有话语权，在性别的差异上，针对女性有一套差别于男性的话语系统。这些话语共同控制和规训着马桥女性的意识，致使让男权的话语建构内化于女性的生存本能。

在马桥的语言现实中，女性的称呼体现出一种“寄生”状态。在马桥的方言中，“小哥”意指姐姐，“小弟”是指妹妹，“小叔”和“小伯”是指姑姑，“小舅”是指姨妈，这种称谓模式并非偶然的语言匮乏，而是一种典型的女性社会性的抹杀。马桥缺少女性的称谓而采用“小”加一个男性成为的模式。这不仅能看成女性的命名权是男性，女性依靠男性称谓而存在；还可以说，女性的地位完全由男权的命名所赋予，女性并不存在其本来的主体性，她们的地位只是男权命名所赋予的“影子”。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认为，“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主体），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波伏娃，1998,p.13）这种对女性命名权的剥夺，实质上是权力对女性存在价值的一种贬抑。马桥女人们谈及月经用“那号事”

来替代，这种语言上的羞耻感，加之自己身体的线条美也也被肥大的裤子遮蔽，都可以看出女性地位的低贱和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对性别差异的管制还深入到了马桥人的性别禁忌风俗上。在马桥人的民间逻辑里，性别、生育和农耕生产是密切相关的，女人不能生育叫做“罢园”——罢工的田园。这意味着不孕的女性被看成是停工的田园，女人的属性被完全工具化为土地的属性。田地也人为地分成“公地”“母田”，母田上下种必须由女性来做而男性绝不能靠近；公地的耕种活动也要靠女人来“臊”。如果破坏了禁忌则地不肯长苗结籽。这些看似神秘的性别禁忌是首先通过人为的命名确立起来的。

马桥对“美”的转化更为深刻。在马桥方言中，“不和气”竟然是指代女性的漂亮。民间文化将个人的相貌姣好用一个带有否定性、冲突性的词汇来记录，这实际上是话语对女性身体的一种“审判”。在马桥的话语中，女人的美丽被视是一种危险的过错，甚至被认为会引发沉船等灾难。这种话语建构强迫漂亮的女性在公共空间必须将脸涂满泥水以祈求自身的安全。这种对美的高度警惕与话语打压，深刻显示了民间话语对性别意识、身体政治甚至是美学感受的极端管制。它要求每一个个体都必须臣服于集体性的、阴暗的话语秩序，任何个性的张扬或生命力的显现，都会被定义为“不和气”而遭到权力的规训。

二、规训与放逐：权力的城邦

在福柯的权力哲学视域中，话语不是自由的，它自诞生开始就与权力如影随形，它更像是一张无孔不入的微观之网，对肉体进行监视、对身份进行定性以及对日常行为精细化操纵。社会通过话语对人们进行规训，对非允许的话语进行放逐。这种规训不仅作用于人的社会身份，更深入到个体的心理结构与生存本能之中。身体成为权力发挥作用的对象，人们借由驯顺与被驯顺的关系来昭示不同人群间的权力高低。马桥的世界中的权力关系借话语的运用体现得尤为明显。马桥的话语权就是“话份儿”——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份，但作为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所谓“隐隐威权的压力”，在福柯看来就是无处不在的权力力学，一种深入身体细微之处的权力机制。

马桥的权力运行首先表现为一种基于命名的身份定性。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指出，社会通过一种“规范化裁定”来将个体个性化，并将其归类、排队。在马桥，一个人的一生往往被锁定在一个设置好的标签之中。以盐早为例，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但在马桥人眼中，他被贴上了“汉奸”的标签，其身份来自他的父辈，他父亲是汉奸，他也只能是万劫不复的汉奸，“汉奸”是确定了个人的品性和一生发展的标签，再也摘不下去了。盐早并非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悲哀的是，他无法逃脱话语对他的定性。后来这种定义已经内化为盐早自我认定的一部分：他活儿干得最多、劳动最刻苦，本可以推举为劳动模范，但是盐早听说后避之为洪水猛兽：“我是个汉奸，如何当得了那个？”这时候，不仅是马桥其他人觉得盐早只该有汉奸的称谓，连他自己也不要求了。权力的规训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全景敞视般的压迫：盐早的一举一动早已被置于“汉奸”这个词汇的显微镜下审视。最终，他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下只能自我阉割：为人平易的盐早连新婚夜还在想着自己的身份，权力地位低到了极点，最终竟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牛哑哑”，彻底失去了话语权，成为被驯顺的肉体，在社会和话语意义上彻底死亡。

这种以命名称谓的方式施加权力的途径还有很多，即福柯（2012,P.216）所谓“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个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识，他通过这种身份与表现他和使他称谓‘个案’的特征、计量、差距、标志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身份的命名是一种使人差异化并将人群分类的方式，“汉奸”就是将贬义的称谓和盐早的软弱、勤奋、朴实联系在了一起，随后权力通过差异化的运作方式将盐

早彻底规训。

而另一方面，罗伯的情况则展示了权力的另一种面貌，罗伯是马桥的革命干部，但终生未婚，别人给他的提的亲他都一一拒绝。罗伯因被怀疑有某种不洁的行为，被冠以“红花爹爹”的诨号，是童身的意思。在马桥的世界中，这个词暗示着一种邪淫与不祥。罗伯在面对这种指控时，并没有反抗，反而表现出一种顺从。人们给罗伯一类人一个特殊的命名，也同时把他的个性与多数人区别开来。在这样的区别化的话语中，人们发现罗伯不收亲是因为他害怕女人、讨厌女人。不仅如此，他还认定女人的腥臭会坏了他的果实，人们根据他的这个特征用女人用过的蓑衣试探他，结果招致他的大发雷霆。打这儿以后，人们再也不敢跟他开同一类的玩笑。罗伯就是在这种命名中受到了马桥人的区别对待。而被打上了“红花爹爹”的标签的罗伯后来从县里回马桥的过程中，只因为拖拉机上坐了个几个女人就不肯搭车、情愿自己走路，他所做的也只能是与马桥其他人拉开距离，变成了自我的放逐。

话语对人的作用，不是规训，就是放逐。福柯认为，“在我们的社会，排斥的程序是为人所熟知的。最明显和熟悉的便是禁律。”（许宝强、袁伟，2001,p.3）这种放逐往往不是通过物理上的监狱，而是通过话语的暴力与禁忌的诅咒来实现。复查的遭遇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复查原本在马桥的话语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复查与罗伯的争吵本无所缘由，一句犯忌的话也并非复查的内心恶毒，但是他的一句无心的骂人话，骂罗伯“翻脚板的”，这句话竟让罗伯第二天就走上了归途，话语正展现出惊人的力量。在马桥，语言具有某种宗教式的魔力，诅咒一旦发出，便在话语场中产生了不可逆的效果。随后复查意识到自己的过失，虽然受到大家的谅解，但仍受到了禁忌的诅咒，日渐消沉，以至于最后难以胜任供销社的简单工作，变成了马桥人眼中的“他者”，被放逐到话语群体的边缘，犯忌影响了他此后几十年的生活，这实际上都是对他的社会性放逐。这种放逐是无声的，它没有围墙，但让复查在熟悉的环境中感到了极度的孤立。

马桥对私奔者的处理方式，则将这种语言规训推向了肉体的惩罚。本义的原妻和三耳朵搞在一起，后来离开了马桥私奔，虽然逃出了马桥的权力规训范围，但马桥的话语机制依然通过“背钉”实施精神上的钉杀。按照老规矩，不贞不义之人不能安生，要将他们的背后钉上九颗铁钉，表示永世不得转身，话语的暴力就是这样规训着每一个马桥人，给那些不符合话语体系的人以遥远的放逐和深切的诅咒。在马桥这个权力的城邦中，身体成为了权力的剧场。无论是盐早的沉默、复查的消沉，还是私奔者背后的“九颗钉”，都说明了话语通过对身体的微观干预实现了宏观的统治。马桥的权力城邦正进行着一次次对个体的识别、矫正与清除，最终在湘南的群山之中，筑起了一座坚不可摧、由禁忌与偏见构成的意志堡垒。

三、拒斥与接受：现代性的烙印

马桥的民间文化有着一套自己的话语生产和规训机制，但马桥并非一个全然封闭、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尽管它拥有浓厚的民间传统和独特的话语逻辑以及固有的意识形态，但在宏大的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它不可避免地面临外来现代性权力意志的介入。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不仅是压制性的，它还具有生产性，能够通过话语构建新的现实。福柯（2012,p.218）认为“事实上，权力是生产性的；它产生现实；它产生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民间对外界权力呈现抗拒的姿态，但最终仍不可避免地对外界的话语做出反应，接纳了外界的话语。这些现代的话语进入马桥的话语体系之中，改变着马桥镇的文化生态。现代的话语或经过改造进入民间的话语之中，或为民间利用，成为施展权力的工具。这一过程构成了马桥意识形态中最为深刻的“现代性烙印”。

马桥人对现代科学的态度是不屑一顾的，在民间的视野中，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科学技术与工业

产物，首先威胁到了他们传统的生存美学与伦理。马桥语境中的“科学”一词被重塑为人懒，不仅科学地砍柴是人懒的体现，连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都是因为人懒诞生的，人们天然地对现代化的事物持一种抗拒和不屑的态度。“科学”一词在马桥话语中就是贬义的，当知青给马桥人介绍合适的担柴方式时，竟被马桥人斥为“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没有什么活头儿了。”

（韩少功，2017,p.43）这种对现代文明的贬低反应，实则是民间话语在面对强势的外部文明时，为了维护自身尊严而修筑的一道心理防线。正如福柯（2016,p.80）所言，“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同样，“晕街”也是特有的针对外部现代性的一种回答，马桥人很少在长乐街过夜，更不会长期居住，他们的解释是“晕街”。普通人向往的现代、先进的事物在马桥人看来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甚至会有胸闷、发烧、脉乱的病出现。作者说这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再生性的事实”。（韩少功，2017,p.169）晕街的诞生就伴随着马桥人对现代性的拒斥。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一）散发（一种虚幻的疾病想象）：马桥人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如果看电视或使用电子设备过多，人就会被先进仪器干涉，就会“散发”。

（二）狠：马桥人对一切现代先进的科技赋予了一层道德败坏的意思。在他们看来，事情做得好与掌握先进的科技，都是“狠”。

（三）现：马桥人的时间意识是模糊、含混的，它有着相反的两种意思，一是指剩余的、保持原貌的；二是指非以前的、非原貌的。

马桥人模糊不清的观念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截然两样。现代的时间意识是“这种现代性是转瞬即逝的——今天的先进到了明天就过时了”（汪民安，2012,p.7），是一种永恒的发展变化的时间观，而马桥人当然不具备这样的特征。福柯讨论了异托邦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当人类处于一种与传统时间完全中断的情况下，异托邦开始完全发挥作用。”（福柯、王喆，2006,p.56）马桥不仅地理方位完全与现代方位相反，连时间也成为一种与传统时间中断的“异托时”，现代的时间观念和意识并不奏效，反而成为一种破碎化的含混形态。

当然，外界的历史带着它的国家意志必然会进入到马桥原生的话语体系中，得到民间话语的改造和兼容。当国家的政治意志与行政权力大规模介入时，马桥原有的语言秩序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最典型的体现，在于民间话语对外来政治术语的“异化式接纳”。“民主仓”和“模范”就得到了民间话语的兼容，人们对它们进行改造，变成符合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常用语。“民主”这个原本代表进步的词汇，在马桥这里迅速演变为人满为患的监牢，成了关押、暴力与剥夺自由的代名词。进入民主仓是件倒霉的事，既要和苍蝇蚊子作斗争，又要耐心服侍劳霸。民主在马桥的话语中走向了它相反的方面。它揭示了现代性权力在进入民间场域时，往往会遭遇一种话语的“滑坡”与变形。

这种博弈在关于“模范”和“觉悟”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耐人寻味。“模范”也有类似的意味，它本身是国家确立劳动典型、是国家规训机制层面的话语，而进入了马桥的话语体系中，只有劳动力低、体弱多病的人才才有资格当模范，因为只有这些人成为模范才能不误农事，这个词被转化成了一种实用的生存互助手段，国家话语被马桥的民间话语反向消解了。在这里，“模范”改变其本意在相反的方面应对着国家权力的侵入。人们利用外来话语的外壳填进民间逻辑的骨肉，实现了一种微观层面的权力共存。这种混杂性正是马桥意识形态的本质：它既不是纯粹的前现代民间文化，更不是彻底的现代社会，而是一个充满了话语裂缝和意义游移的过渡地带。

到了这一博弈的终极阶段，民间文化甚至开始学会利用外部权力的话语来解决内部的恩怨与矛盾。在福柯看来，语言不仅有描述、记录事件的功能，也有将其作为斗争武器的功能。在“台湾”与“茂公”的纠葛中，有些国家权力话语完全进入民间，在民间文化的规训层面上发挥强大的权力。

以“台湾”为例，台湾在主流话语中指中国的一个省，它本来是一个宏大的政治符号，代表着敌对和对峙。而在马桥，它转变为对个体户茂公的道德审判。从前茂公当过日据时期遗留下来的维持会会长，和马桥人拉开了距离。他性格执拗，长期不加入合作社，当他试图拒绝走向现代、维护传统土地时，马桥人巧妙而熟练地运用了外部的政治权力话语。茂公最终走向孤立与凋零，不仅是因为他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更由于他无法在马桥民间话语中为自己找到一个合法的“话份儿”。

现代性在马桥留下的烙印，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话语拉锯战。从最初的“晕街”和“散发”表现出的身体反抗，到后来对“民主”、“科学”等词汇的歪曲，再到主动借用“台湾”等权力意志术语进行内部公审，马桥展示了一个民间城邦在权力洪流中的顽强生存。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通过这些词条向我们揭示了话语的混杂形态。权力总是在碰撞中相互渗透、相互改变。马桥的历史，是一部由话语的拒斥与接纳交织而成的、充满了血肉与迷雾的变迁史。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Wu Che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9844-3087>

Florence Kuek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1630-9347>

References

- 福柯 (2001):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 [Foucault, Michel (2001).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Mo Weimin.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福柯 (2012):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Foucault, Michel (2012).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Liu Beicheng & Yang Yuany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福柯 (2016): 《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Foucault, Michel (2016).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Yu Biping.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福柯、王喆 (2006): “另类空间”，《世界哲学》(06): 52-57。
- [Foucault Michel, Wang Zhe (2006). “Of Other Spaces.” *World Philosophy* (06): 52-57.]
- 韩少功 (2017): 《马桥词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Han Shaogong (2017). *A Dictionary of Maqiao*. Beijing Octob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李智 (2017): “从权力话语到话语权力——兼对福柯话语理论的一种哲学批判”，《新视野》(02): 108-113。
- [Li Zhi (2017). “From Power Discourse to Discourse Power: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Foucault's Discourse Theory.” *New Horizons* (02): 108-113.]
- 汪民安 (2012): 《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
- [Wang Minan (2012). *Modernit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西蒙娜·德·波伏娃 (1998): 《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
- [Beauvoir, Simone de (1998). *The Second Sex*, trans. Tao Tiezhu. China Book Press.]
- 许宝强、袁伟选编 (2001):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 [Xu Baoqiang, Yuan Wei (Eds.) (2001).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